

怀特海哲学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美]J. B. 科布 / 文 邵 刚 杨金颖 / 译

一、后现代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在英语中是个很古怪的语词。长期以来，“现代”、“当代”和“当今”这语词几乎被交替地使用。“现代”的内容随着时间而变化。在技术上，19世纪所说的“现代”在20世纪则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然而，“现代”这个语词还附属于特定的风格。例如，“现代”建筑并非仅指当前时尚的各种建筑，它也特指包豪斯（Bauhaus）式的风格。那些了解这种风格并要超越它的建筑师们，不是说那些曾经是现代的东西已经不再是现代的了，就是自称为“后现代的”。事实上，某些人选择了自封为“后现代的”。

但是，“现代”这个语词之更为普遍和更为重要的用法是指一种更为广泛的运动和时期。曾有一些关于“现代”欧洲历史的教科书，但这里的现代是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而言的。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崩溃被当作古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线，而中世纪和现代的界线却不那么分明。尽管14世纪当然还是中世纪，而17世纪则普遍被视为现代。

直到最近，现代历史被假定延续到了现在、并仍处于过程之中。但在20世纪，人们日益感到，新近历史（recent past）的主要特征正在终结。“后”这个语词便被用来描述这种新的状况。当欧洲帝国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的时候，这种新的状况被描述为后殖民状况。当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界的意义时，人们谈论的是一个后民族主义的新纪元。当工业中心输出其传统产业并致力于信息技术时，人们又说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当基督教在政治上日益被废除并失信于知识分子时，这种新的状况可能被称为后基督时代。当启蒙运动的基本假定变得更为可疑时，人们可能把这些新的文化发展和理智发展描述为后启蒙运动。当信奉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各种理论失去了其权势时，人们把这种新的趋势称为后意识形态。当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男权统治的陈旧模式并消解了其自我证明时，他们又可能提倡一个后父权制的社会。

由于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深刻变革，在某些欧洲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新的全球社会和过去几个世纪之间的区别与近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区别同样巨大。我们再也无法基于那些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假定和风格生活下去了，我们的世界是后现代的。

这种标签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对现代世界的特征提供多少线索。这个语词被如此之多地运用并被赋予如此不同的意义，以致它本身现在也过时了。某些人把“后现代”运动视为一种短命的时尚，并谈到了所谓“后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之最具影响的形式常常被称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它显然把重点放在了对起源于现代、并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我们的西方文化的各种假定的批判上。这种批判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须进行的，但一个新世界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对旧世界的消解上。

当然，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种。“建设性的”这个语词是相对于“解构性的”而言的，它强调的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积极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它反对解构现代性的许多特征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批判和拒斥应该是由对重构的各种建议相伴随的。

这一标签是由主编了纽约州立大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丛书》的D. 格里芬（David Griffin）提出的，但他赋予这一标签的立场已经有些时日了。他根据A. N. 怀特海的哲学得出了这一我也赞成的标签。某些受怀特海影响的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语词，但我们并没有强调它，而且其最近的流行也不是我们使用的结果。

怀特海并没有用过这个语词，但他以一种暗示现代已经结束的方式使用了“现代”这个语词。他在20世纪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名为《科学与现代世界》的著作，他在书中表明，他所说的“现代科学”现在被取代了。它和科学本身已被证明为是无效的这种实在观密切相关。我们的任务是重构一种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新发展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由于整个现代文化与同一种世界观密切相关，必需的变革乃是普遍性的。怀特海在书中还暗示了这种必需的变革的方向，并在后来更为充分地发展了它。于是，我们中的某些人便很容易把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说成是后现代的了。

我们这些受怀特海影响的人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曾由其他一些基于不同的思想史的人得出过。例如，女权主义者对怀特海主义者所反对的西方文化遗产中的某些特征进行了许多批判，她们的批判往往比我们已有的批判更加丰富和尖锐。生态主义者也加入到了怀特海主义者当中，反对现代西方人的那种忽视自然界或只是把它当作人所利用的工具的倾向。几千年来，佛教徒也拒斥了某些怀特海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发现的错误观念。因此，格里芬主编的丛书还包括那些殊少受到怀特海影响、但却得出了类似结论的人的著作。

不过，怀特海哲学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假定提供了最为系统和明确的论述。我将主要地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明这些假定，同时也承认，其他的论述是可能的，而且其他的人（如女权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也对这一当代运动的重意义做出了独特贡献。

二、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

启蒙运动把机器当作其基本的实在模式，甚至有生命的东西也被理解成了复杂的机械。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一切力量最终都是由推和拉（pushes and pulls）运作的，技术被排除了。总之，世界只能根据运动中的物质来理解，万物最终也都能通过运动的规律得到解释。

对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来说，这种实在观是极富成效的。这种成效性又强化了这种世界观的信心，它还通过作为一

个整体的文化强化了其认同。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并不想把他们自己视为这架世界机器的组成部分。对这种世界观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笛卡尔就认为，人心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万物也是物质的，人心则是精神的并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而运作。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彻底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二元论提出了一些不可克服的哲学问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被视为克服它的一种斗争。某些哲学家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他人则成了现象主义者，还有些人成了唯心主义者。但在总体上，克服二元论的方案尚未取得成功。

总之，在整个19世纪，科学家都是基于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假定而继续其工作的。只是由于相对论的发展及其质能转换成为世界的基础，以及亚原子的世界与其世界观不尽一致，他们才产生了动摇。由于某些原因，它被视为微粒；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它又成了波。在这种世界观的分化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来自不存在光藉以被传播的以太这一发现。

在总体上，二元论已经被一般的文化所接受。直到今天，它以其对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划分而构造了宇宙的结构。大多数数人（无论他们是否清晰地表达了它）都把看到和摸到的世界视为是物质的，同时他们又自认为超越了这种纯物质的状态。尽管进化的观点对这种二元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不知何故，这两种不尽一致的观念仍在一般的文化和大学中并肩共存。

显然，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理智混乱和混沌的状况。它用唯物主义的语词来思考世界，但用这些语词，它既不能说明自然界，也不能说明它是如何与人类相关的。它不能提供实体的概念，而物质又内在地是一个实体主义的概念，因为物质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形式、但仍然是同一种物质。一个物质客体在它所占的空间中排斥其他客体，但在现实世界中，各种现实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种共同的回应决定了这个世界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它不能通过现代思想与强加给它的各种图式相一致的话，那么在原则上，许多人都会认为它不可能被理解。我们必须完全抛弃任何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的那种理解的目标。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种理性的方案是一种失败的方案。心灵能够进行分析，但它不可能综合或达到任何普遍的真理。

许多后现代主义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它把现代性描述为理性的时代，把后现代性描述为必须抛弃达到对世界的一种概观的所有尝试的时代。形而上学被视为过时了。一切思想都必须被理解为是和它藉以产生的那种受到限定的立场相关的。特别是，如果这种立场是一种特权立场，那它就会被疑为是一种统治的工具。这种后现代的事业正在揭开现代思想家们的各种伪装，它不再致力于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自然观，更何况那种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

我一直在特异地描述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一工作中有许多事情要做。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扩展了对那些进入了人的思想的许多非理性因素的理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思想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马克思向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我们的阶级观点而形成的，弗洛伊德揭示了在我们所想像的理性思维中起作用的许多无意识力量。现在，妇女又迫使我们承认性别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的。

撇开所有这一切，怀特海式的后现代主义者仍相信，致力于全面的思维是适当的和必需的。我们并不认为，启蒙运动的概念性的坍塌表明了一般概念思维的局限。在我们摒弃对理智和理性之广泛的探究之前，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检验其他各种概念性的有用性。

怀特海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从实体思维转向事件思维。显然，根据机械的模式思维是实体思维的一个例证。一般来说，根据感觉知觉的材料对物体进行哲学分析，即使是在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感性经验中或通过我们的感性经验发现实体时，也会使我们处于实体思维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还有一种事件或事情的概念。正如我们可能想到桌子和钟表一样，我们也能想到对话和车祸。现代思维限定我们把对话和车祸当作了人或事件对客体的作用，换言之，事件预设了实体。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事件是首要的实在，而且我们认为是实体的东西乃是事件之复杂的结构。

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佛教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印度教的实体论转向了事件的第一性，赫拉克利特由于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享有盛誉，黑格尔当然也强调了事物的过程性。20世纪的新进展是，当代物理学的材料呼唤根据一种事件哲学来进行解释。怀特海哲学就是贯彻这一方案的一种最持久、最严格的努力，这乃是一种早期的事件第一性的倡导者们不可能具有的后现代的意义。

当自然被视为物质实体时，致力于克服二元论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当人们首先根据事件来认识自然的时候，一种非二元的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人的经验也具有一种事件的特性，人的经验当然会具有一些我们不指望在单细胞机体（当然也不会分子或电子事件）中发现的特性。不过，认同那些一切事件都分有的特性、并想像更为复杂的事件是如何基于更简单的事件演化而来的，却是可能的。分层和差异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人类的研究包括了那些和对自然界的研究不甚相关的层面。但是，在这两个事件集合之间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划分。

正如科学已经将复杂的“物质的”客体分解为较小的客体一样，它也能将复杂的事件分解为它藉以构成的较小的事件。在某个点上，我们达到了那些不能被进一步划分的事件。瞬间的人类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事件，量子的爆发可能也是如此，怀特海称这些单位事件为“现实际遇（actual occasions）”。在怀特海看来，现实际遇最好被理解为它们与其他事件的关系的综合。换言之，先前的事件分有了构成它们的东西。当我们根据实体来思维时，我们会问，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而当我们根据事件来思维时，我们会承认，“现实际遇”乃是各种关系的综合，而且不能脱离这些关系而存在。

进而，如果某些事件（如人类经验的瞬间）中有内在的价值，那么一切事件中也有内在的价值。这一点尽管对其他感性存在来说尤为重要，但它却使我们对无机界的态度产生了差异。当然，事物的相互关系表明，一切事物都对另一事物具有价值。但重要的是要加上，没有任何事物只对其他事物具有价值，每一种“现实际遇”也都有其自在价值和自为价值。

这三点对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并不意味着限制怀特海主义者。首先，二元论被拒绝了，人类认识到了他们和万物的密切关系。其次，个人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人类乃是复杂的存在之网的组成部分。第三，每一种“现实际遇”都有价值，只是根据其对人类健康存在的贡献来评价非人类实体的价值，是错误的。

D. 格里芬在谈到对自然界的这种后现代理解时用了“魅力的再现（re-enchantment）”这样的语词。我们所栖居的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活动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世界，而非一个死气沉沉的、被动的、没有价值的世界。我们应该体验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并分有自然，而非疏离一个纯客观的世界。这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它诉诸的是一种再现魅力的科学，即一种寻求把世界理解为活生生的、活动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的科学。第二，它诉诸反思那些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公共政策，这一点对经济学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在形成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学科。

三、后现代科学

发展一种后现代世界观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科学在目前的混乱。这种混乱有助于并适合于那些想要终结提出各种全面的世界观的方案的人，他们鼓励我们放弃对任何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常常自相矛盾地提出了各

种普遍主义的论据，但这里不是寻求那些由于他们的观点而引起的内在冲突的地方。他们对理性的批判还向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并不需要的非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各种形式敞开了大门。

当然，围绕事件的第一性重构科学的任务，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对此做出贡献。不过，我想你们可能对已经采取的某些步骤感兴趣。我将简要地报告一下相对论和量子论中的某些进展。

怀特海本人对构造一种相对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目的不是要质疑爱因斯坦理论的经验精确性，而是相信在其公式中有某些弱点（它们可以通过更彻底地摈弃实体思维而得到纠正）。他发现，爱因斯坦的空一时观尤为麻烦。爱因斯坦似乎认为空一时具有实体性，而怀特海相信它不具有实体性。

争论的焦点在于爱因斯坦的这样一种陈述，即光线的曲率是以空间的曲率为基础的。怀特海则相信，空间不是一种可以弯曲或拉直的东西。作为一个数学家，他指出，任何一个可以被视为椭圆式或双曲线式的空间，也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欧几里德式的空间。断言空间的曲率是一个物理的或形而上学的事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并导致了一种不能被真正理解的理论。

怀特海提出，类似的结论可以通过专注于多个时间系统而获得。在他的《相对性原理》一书中，他在数学细节上得出了这一结论。根据他的公式得出的预言和爱因斯坦的预言如此之接近，以致人们长期不能验证这两个相反的公式。然而，大约20年前，有关潮汐的各种更精确的检验开始挑战怀特海的预言。他的公式诉诸的是总括宇宙的全部引力，而爱因斯坦则运用了一个非线性方程。

怀特海意识到，经验证据也许会挑战他的公式。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根本的东西处于危险之中。他提供了第二个其结论据他说等价于爱因斯坦的结论的公式，但他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只是在最近，由于R. 罗素（Robert Russell）的工作，这第二个怀特海式的公式才得以公开。和另一个方程一样，他用多个时间系统代替了空间的曲率。它表明，可以给出对相对性的一种更为明智的说明。

一百年前，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对物理学家的共同体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数世纪以来，物理学一直在寻求理解和解释自然。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混乱并没有阻碍预言和控制中的进步，而且许多物理学家放弃了致力于理解。大多数人现在都局限于对新的理论感兴趣，只要它们能得出新的预言。因此，一种更为明智的理論的可应用性（availability）被忽视了，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了怀特海的成果。

然而，还有另一个可以证明怀特海理论具有各种优势的方面。它无需假定光速是能量转换之绝对的极限。对怀特海来说，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今天，就存在着对更快的转换的证明。

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问题不只是能量的转换，而且会产生各种影响。因此，他为一种思想实验（它表明，两个反向旋转的粒子在瞬间可能是相通的）所困扰。这个思想实验假定，有一对粒子，如果一个粒子的旋转发生了变化，那么另一个粒子的旋转也会改变，这种变化与这对粒子的距离无关。这一理论被称为“贝尔定理（Bell's theorem）”。实验已经证明，“贝尔定理”是正确的。在一定距离上的影响，实际上是瞬间的。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中，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怀特海则面向了这种可能性。他的判断是，通过他所说的纯粹的物理领悟（pure physical prehensions），能量的转换取决于接触（contiguity），因而可能需要时间来波及一定的距离。但他认为，还有另一种途径，即各种际遇可能是相关的，因为空间距离不是决定性的。他称此为“混杂的物理感受（hybrid physical feeling）”。尽管一种“混杂的物理感受”不能转换能量，但却能传递信息。这就是一种际遇的“心理极（mental pole）”对另一种际遇的影响。在人类中，这种影响可以在心理的心灵感应中找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可能在更为简单的际遇中发生。

根据我的理解，在量子水平上有证据表明，一种际遇中的事件受到了整个量子世界的影响。虽然我知道不足以肯定这一点，或者，这种影响是否是瞬间的或可能在光速上被考察，但是，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如果这种影响是瞬间的，那么怀特海哲学就可能提供一个其他理论似乎缺乏的例证。

量子理论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根本的困难。实验者们根据心中的两种模式来研究各种材料，他们认为，光和各种类似的现象必定或是由波或粒子构成的。这一判断表明，实体思维统治了其心灵。对某种类似于早期的原子的事物来说，“粒子”是一个新语词，撇开其名称，它也被证明为是可分的。粒子被想像为游弋于空间的物质微粒。另一方面，波则是运动的模式，因而更像“事件”。然而，这种最基本的模式取自水面的运动。声波是空气的运动。人们假定，光波也有一种物质基础，它被称为“以太”。当实验表明不存在“以太”时，尽管光波的观念在本质上成了不可理解的，但这种语言被保留下来了，因为用来分析波运动的数学对光的某些特征来说也还是有用的。

众所周知，某些实验表明了光的粒子性，其他一些实验则表明了光的波动性。不幸的是，波和粒子的概念没有被明智地应用于同一个东西。结果，强加在这种混乱上的极性（polarity）概念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澄清。

还有另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如果人们摈弃实体思维并根据事件来理解世界的话，就可能根据一种事件场（a field of events）来观察实验状况。在事件场中，际遇关系的某些模式可能很像“粒子”，其他的关系模式则可能很像波。我不想暗示，这种简单的评述解决了什么问题，我只是说它为思考这些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语境。

怀特海本人并没有写过关于量子论的著作，但他的形而上学很容易被当作一种量子理论。在他看来，世界是由相关的“现实际遇”构成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量子事件。

与怀特海的思想最相像的量子学家是D. 博姆（David Bohm）。博姆根据事件而非实体写作了大量关于思想的意义的著作，他提出了思考单位事件的全息（hologram）模式，即一种和怀特海德的“现实际遇”模式十分相似的模式。而且，和怀特海不同的是，他和B. 希利（Basil Hiley）一起发展了一种基于这种不同视域的量子理论（它可以预测一切已知的量子现象）。和怀特海仍可利用的相对论一样，博姆的公式简要地预测了既有的理论已经预测了的东西。其优点是一致性和可理解性，而不是预测。不幸的是，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一直受到限制地认为，唯一能够检验一种理论的价值的是其预测的能力以及经验上的证实，所以，这一理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必须分享博姆的这样一种希冀，即可能从他的公式中推出某些不同的、可检验的预测。

建设性的后现代远见对其他科学也有意义。在现代，所有研究生命事物的科学都似乎将其主体视作了纯粹的客体。排斥任何有目的的世界，一直是这种现代方案的组成部分。除了其明显的意义以外，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的行为的任何作用都被否定了。或者，即使承认那些明显有目的的行为的意义，也只是说它虽然是有目的的，但实际上它源自各种机械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据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没有理由否认动物的目的的作用。承认这些目的，使得对进化过程的一种更为恰当和有理的说明成为可能。

过去，野生动物几乎完全是在监禁中被研究的。它们常常被解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动物的行为可以通过其组成部分的行为得到说明。许多知识都是以这种还原主义的方式得知的，但许多方面也很模糊。只是到了最近，才有少数学者在野外花了大量时间与动物相处。他们学到了许多实验室里决不可能发现的东西，但他们的工作并没得到同行的真正鼓励。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它很难被视为科学。相反，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观点看，它乃是实验室研究也应该了解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源。

研究大脑和主观经验的关系，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能够做出重大区分的另一个领域，这一领域中的大量工作仍然是还

原主义的。对主观经验的解释是在大脑活动中寻求的，但人们却很少考虑到主观经验作为一种偶然动因分有了过程这种可能性。幸运的是，也有一些例外。R. 斯佩里 (Roger Sperry) 对裂脑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了意识经验的偶然作用，这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支持的那种研究的方向。

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现代思想一直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里，我只想根据我已经描述过的那种模式对它的影响来考察它。正如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被认为是由在空一时上彼此外在相关的物质微粒构成的一样，人类也被认为是由彼此外在相关的个体构成的。既然如此，这些关系便被视为契约性的 (contractual)。政治和经济理论都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世纪，教会为牧师权威和政治权威提供了合法性，这给了宗教机构一定的特权。政治领袖们对此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在现代性初见端倪时，他们便寻求一种不包括教会的合法性。尽管他们可能声称神圣的王权，但如果这种权力来自对社会状况本身的一种分析，那么最好是保持缄默。因此，他们偏爱这种社会契约理论。

这种理论是以一种神话为基础的。这种观念是，人类起初是无政府的，每一个家庭只寻求其自身的利益，不对他人负责，而且他们如何对待他人也不受约束。这同样意味着，别人如何对待他们也不受约束。结果很不令人满意。在T. 布斯著名的公式中，生命是“肮脏的、野蛮的和短暂的”。在霍布斯看来，它是如此之坏，以致有利于每一个家庭以自由为代价而获得安全。他推论到，社会契约是由这样一种让度 (surrender) 构成的，即所有人都在个人安全和财产的交流中把个人自由让给了君主。J. 洛克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如此可怕的后果，因此他认为，某些人的自由在契约中是受到保护的。美国宪法就是建立在洛克的理论及其这样一种陈述的基础上的，即所有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然，这是一幅完全非历史的图景。人类是由密切相关的氏族共同体演化而来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后，他们才逐步发展了更多的个人自治。当然，这一理论的合理之处是，正如他们发展了个性一样，对他们来说，接受有效的政府控制对保证安全仍很重要。这乃是霍布斯式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的基石。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不能保证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统治者将失去其合法性。只要这种安全受到保护，缺乏自由或公正等抗议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争论霍布斯和洛克的长处，而是要强调这两种形式中的现代政治理论的那种原子论的个人主义。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强调的是，在他们发展人的个性以前，人就聚集在了各个共同体之中。这完全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学事实。一个婴儿只有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才会成为一个成人，其中，契约起着很小的作用。

如此看来，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共同体需要某种统治模式，这已经适用于家庭。问题是，父亲 (或母亲) 是否做出了所有决定，或者是否两者共同做出决定，甚或孩子也参与了决策。我们可以假定，在许多情况下，父亲有体力来强加他的意志。问题在于，它是否最好地反映了家庭内部整个关系模式的本质。所有家庭成员都通过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获益了吗？它是否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了父亲更深层的目的了呢？

一种后现代的研究方法不可能规定特定的规则，但它鼓励各种实验。显然，一个婴儿不可能参与家庭决策，一个8岁的儿童也不可能扮演父母的角色。但是，当我们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理解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和他人的关系构成的时候，听取所有人的声音并积极考虑其意见，则是有意义的。

正如个人不能脱离和他人的关系而存在一样，家庭也依赖于更大的关系模式。在每一种情况下，某些模式总是给定的，而且如此给定的模式得到了尊重。人决不会始于一块白板 (a blank slate)。理想的情况是，每一个家庭作为他人当中的一个家庭，都参与了肯定、批判和修正那些更大的模式。当他们分有了那些形成其关系的决策时，人或家庭也就得到了发展。

在此，我的意图不是要阐明一种政治理论，而是要指明，一种后现代理论强调了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尽管现代思想始于分散的权力，但却直接走向了权力的集中。一旦权力被集中起来，统治者便会自上而下地组织权力。在美国，一些地方共同体之所以有权，只是因为它是由个别州政府授予的。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州政府的权力则可能是由各个市和县授予的。整个权威的结构可能来自共同体、共同体的共同体 (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共同体的共同体的共同体 (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

对人类的相同理解支撑了现代经济理论。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被视为一个只在市场交易和契约中与他人相关的原子个体。因此，经济理论并没有像为正义那样为共同体或共同体的这些价值留有余地，其目的只是增加经济活动或创造财富。这种财富是在市场基于没有外部干预的供求关系中确定价格的时候增加的。对经济学家来说，最初作为这种模式而服务的是乡村市场，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交换提供了一种有利的背景。然而，经济分析表明，更大的市场激发了更快的发展。因为人的关系而非市场交换在经济学中并无地位，经济学家偏爱的是越来越大的市场，直至今天的全球市场。

过去，市场总是包含了政治的界限。这并没有保证它们得到了良好的管理，但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对共同体和正义的关注可能对其霸权设定了某些限制，并削弱了其影响。今天，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来调节市场，或保护共同体使其免受其害。

一种后现代的经济将尽可能地会回到乡村市场中去，即经济结构将在政治结构中运行，而且市场离被管理的人越近，人真正参与的机会就越多。然而，当代社会所必需的许多商品显然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生产，但偏爱一种和基本的政治结构相伴随的基本的经济结构还是可能的。一个更大的市场需要些什么，应该处于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体的管辖之下。而那种还需要更大市场的生产，则应该受到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体的共同体的监督。尽管它们可能达到了全球水平，但在目前的意义上还不是一种全球经济。这并不能抹杀共同体之间的界限，或伤害其利益。

现代思想是二元论的，这已经在与自然相关的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反映，这在美国尤为明显。欧洲人的政策一般地说在美洲人那里、尤其是在美国人那里，引起了对自然 (它只是被看作自然资源) 的一场迅速开发。经济理论没有以其他方式描绘自然，甚至自然资源也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它们实际上已经从标准的经济学教课书 (它把劳动和资本视为生产之唯一重要的因素) 中消失了。

甚至到了现在，当资源的极限和污染的问题迫使其自身引起每一个人的注意时，我们的来自现代性的遗产也很不利于一种恰当的回答。我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算计着保护自然界的成本。当我们问到采取何种政策应对全球变暖时，经济学家倾向于劝告我们不要进行任何有代价的变革。他们论证说，如果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我们就将处于为全球变暖付出代价的地位。

五、结论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有兴趣表明，科学之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形式是通过特殊的视域而形成的，而且并不具有它们所自称的那种普遍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通常不鼓励尝试发展更好的理论，而这种尝试对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似乎是很重要的。

有些类似的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表明了究竟有多少被广泛接受的政策具有那些表达了当权者的偏见和自私的假定。他们常常会做一些辉煌的工作，以表明那些显现在支持他们的人当中的一些自欺其人的因素。但他们又不想继续提出其他政策，他们可能把已经提出的任何政策都视为他人偏见和利益的表达。结果，他们不支持任何政策。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看，没有政策指导决策，社会就不可能运作。一切都可能被玷污，而且我们不应假装没有个人利益，或在我们的判断中没有偏见。但是，不改进公共政策（尽管它可能是模糊的），世界就不会得以幸存。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宣称，他们关于哲学、科学或公共政策的观念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具有有限理性（limited understanding）的有限存在，而且我们根据多种视域中的一种视域来看待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视域受到许多相对化的因素制约，而且这些视域决定了支撑我们的那种整体性的特征。但我们也相信，我们根据各种特殊视域观察到的东西包括了总是难以理解的（always-elusive）真理的有效价值的因素。我们还相信，面向他人根据其不同视域观察到的东西，我们就可能修正和扩展我们目前的思维。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且特别的是，它本身尚处于过程之中。

（John B. Cobb, Jr,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原载：Conference Papers of Whitehead and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Beijing, 2002, 曲跃厚校，责任编辑：鲁旭东）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07 传真：(010)65137826